

【名家背影】

我所认识的外交家章汉夫

□ 万伯翱

中国外交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辉煌成果,我们应该了解和记住那些对新中国外交卓有贡献的人物。

在解放战争中曾任“杨罗耿”兵团(指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耿飚任参谋长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参谋长的耿飚,1950年元月,他直接由毛主席、周总理批准转业,到外交部上任。这位神奇将军带着战争的硝烟,自己开着解放战争中缴获国民党中将罗历戎的美式吉普,到刚挂牌的外交部报名上班了。他是开国第一位派往西方担任中国驻外大使的外交官,1960年初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1969年毛主席、周总理又派他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副部长级大使,成为著名的“将军大使”。这位著名外交家在他的长篇回忆录第四章“外交部内外——副部长们”中,重点写了他敬佩的亦师亦友的外交家章汉夫。

章汉夫(1905-1972,江苏武进人)是位行政五级的副部长。1927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后即转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是罕见的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学生,在校期间组织和参加了五四运动,毕业后先去华盛顿大学留学攻读经济与对外贸易,后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1928年,23岁的章汉夫被党派往苏联留学深造。1931年初他从莫斯科回国后,被

党中央派往香港从事地下工作,后又调往广东任宣传部长。当党的早期著名领袖蔡和森被捕后,章汉夫曾代理他任广东省委书记。同年12月章汉夫在香港不幸被捕,经父亲多方疏通营救,被押送出境。他在上海很快又接上组织关系后,曾任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等要职。1933年5月,在中共上海地下工作遭受严重破坏时,章汉夫再度被国民党反动政权拘捕。其父谢仁冰通过党外有影响力的爱国民主人士邵力子施以援手,“念其年轻无知”,被解往“苏州反省院”,花了九十两黄金才把他保释出来,他却不顾家人再三苦劝和警告,于1935年到上海,与党在上海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人周扬、夏衍等迅速取得联系,参加了文化学术界统一战线的工作。面对白色恐怖,朝夕都有被捕和牺牲的可能,他不得不对父母亲说:“我对革命的立场不能改变,你们只当没有我这个儿子好了!”以此表达他终生奉献给党和共产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决心。

有一次参加活动时,章汉夫被一直盯梢的特务逮捕,与同时被抓捕的陶铸同志双腿捆在一起,关进了苏州大牢。虽遭严刑拷打,他坚决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拒绝说出党的任何机密。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出狱,即被任命为《新华日报》总编辑,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报道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方针。他还撰写过大量时事政治文章,这些颇具文采的文章在当时的国统区产生了不小影响。上海刚解放,他即被任命为市委常委并兼任外事处处长,很快又被中央调到新组建的外交部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后,根据党中央指示,章汉夫随董必武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成为我党派往联合国最早的外交人员。

1950年初,外交部建立时,

章汉夫是三位副部长之一。他是周总理十分得力的助手,担当了外交部的许多工作。

1953年,我和乔宗淮就读于北京育才小学,他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我们相识相知至今。他才华横溢的父亲乔冠华后来成为我国外交部第四任外长。后来宗淮担任了二十多年外交部副部长级的工作,也成为一位资深外交官。他的温文尔雅又美丽坚强的母亲龚澎是党和政府第一位新闻发言人,抗战胜利后跟随毛主席、周总理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代表我党对中外记者发言。外交部组建时,她为首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上世纪60年代中期,她已成为外交部部长助理,与乔冠华同为周总理在外交方面强有力的助手。

龚澎的姐姐龚普生,就是章汉夫的夫人,也是位很优秀的外交官,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一对同胞姊妹花同时盛开在外交部,真是罕见的传奇。在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乔宗淮带我去北京东城外交部街47号他姨妈龚普生和姨夫章汉夫家玩。这是一座解放前的达官贵人留下的三层小洋楼,面积不大却精巧适用。听说司徒雷登也在此居住过。总是戴着一副金色细框近视镜,有些发福,一派学者风度的章汉夫和个子高于他的龚普生阿姨热情地招待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给我们糖果吃,也给我们讲国外见闻、外交知识和礼仪,这些开蒙教育使我们终身获益。后来,章汉夫喜欢一边抽着中华烟(红彤彤的烟盒一个也不扔,攒下留给男孩子们玩),一边认真听宗淮讲部内外群众的呼声。宗淮考入清华大学后,章汉夫就更喜听他汇报、讲解国内外形势。

1961年5月,章汉夫作为副团长随陈毅参加关于老挝问题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这是建国以来我国参加的最具规模的重要国际会议。陈毅团长率代表团

一些同志于1961年7月4日回国,章汉夫代陈毅外长任团长。外交代表团在章汉夫率领下,参加了这次少见的长达十四个月的马拉松似的大型国际会议。章汉夫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激烈的唇枪舌剑,以他灵活机智的应变能力和丰富的国际外交知识,克服许多艰难曲折,推动着大会一步一步向前。1962年7月全体与会国根据万隆会议精神,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共识,最终签署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使这次日内瓦国际会议圆满结束,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和地位。“汉夫同志是功不可没的。”耿飚回忆录中再三肯定章汉夫在此次外交活动中的功劳。

1968年3月,章汉夫刚刚从医院出院回家就被当成“叛徒”带走,从此他和妻子及两个宝贝女儿音书两断,在秦城被监禁四年,并于1972年冤死在狱中。从此,外交部“总值班员”办公室的灯光(他总是工作到下半夜才回家)消失了,孩子们永远听不到他讲童话故事的惟妙惟肖的声音和表情了。

1979年9月18日党中央给章汉夫举行了平反昭雪和追悼大会。我还是摘用当时亲到追悼会现场的他的老友耿飚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长篇追悼文章《回忆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章汉夫同志》(1987年9月3日),结束我的怀念小文吧:“一致公认:章汉夫作为外交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外交部一贯对干部坚持党的原则,公道正派,不搞亲疏。”“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和工作作风,对于提高外交战线、广大干部的政策水平和业务是很有意义的。”

(本文作者为原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作家)

注:本文参阅了《世界知识出版社》的《章汉夫传》。

左图为章汉夫、龚普生夫妇



【谈古论今】

孔子的财富观

□ 徐宏力

在《论语·公冶长》中有一段对话,子贡问孔子: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希望听听老师对我的看法。孔子打了个比方:你是一种器皿。子贡又问:什么器皿?孔子说:“瑚琏。”这一评价很微妙。子贡在生意场上非常成功,被称为“孔门儒商第一人”。在传统社会中,商人有钱,但没有现在这样高的地位,士农工商四民,商居尾,而且老百姓一直有无商不奸的看法,做生意肯定要贱买贵卖,否则怎么赚钱?孔子有经世之愿,想从政;子贡有经商之道,想发财。从孔子“君子不器”的观点看,器非道,是物质工具,属于形而下的东西,孔子将子贡比作一种器皿,评价不太高。但瑚琏非一般器用之物,而是神圣的礼器。倡导礼乐文明的孔子借此赞扬学生有宗庙之才。这种评价比较高,而非最高。青年学者颜回才是孔子的第一爱徒。

孔子的财富观是有前提的,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执鞭之士”做些看门修路的简单工作。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要能发财,即便干些普通职业,他也愿意。如果不可求富,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普通职业是发不了财的,孔子也就是那么一说。他在这里想说富贵不是坏事,关键不在求富与不求富,而在可求与不可求,可与不可的标准在于是否合于道义,不在高低贵贱。现代国学要重视孔子“富而可求”的思想,这才能与商业文明贯通。没有利益驱动就没有活力,是贫困世界;只有利益驱动而没有正义,是小人世界。

孔子不反对功利,反对过度功利。

《论语·述而》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吃家常饭,喝白开水,枕着胳膊侧卧(姿态很像后世寺庙里的卧佛),过普通人的生活,乐此不疲。无道义的富贵就像浮云一样没有根基,随时可能飘走,并不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幸福。这段文字说的是“孔颜之乐”,“孔”是孔子,“颜”是颜回,这师徒两人的价值观最为接近,也最能代表原始儒家对财富与道义关系的看法。他们并不甘于清贫,但如果为了求道非要如此不可,也心安理得。富贵乐道,穷困也乐道,这是根生的幸福。

孔子重道,不贱商,对商人持有保留的接受态度。宋明理学则不太平衡,他们认为义基于天理,利基于人欲,两者不可调和,将义利关系绝对化了。朱熹的看法还算活络,朝后退了一步,他认为功利与德性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得道义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义功利不至者”。做人好,成功的概率就高。但是,好人不得好报的事情也是存在的。如果面对义与利两选其一的无奈,人要舍利取义,因为义大于利,这是儒家的主流观点。

晚清状元张謇脱袍下海,心有不甘,他说本人是“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有缘,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虎”。自嘲商人身份,表现出文人的百般不情愿。作为身不由己的市场角色,不把儒学带进经济

圈,缺少影响实业风气的自觉性,没有端正商道的能力,必然困惑于双重人格。

北宋灭亡以后,孔子嫡传的衍圣公孔瑞友逃难到了浙江衢州,以后就在那里生了根。如今的北孔后代已非嫡长。然而,谁是正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化重心的南移,从此江浙一带成了才俊辈出的地方,历史上出的状元多,新中国出的院士多。人杰地灵要有物质根基,江南是鱼米之乡,人们好混生活,顺势成全了耕读之乐,容易平衡。孔瑞友及其后代乐不思蜀,说明江浙一代有文化人生活的闲适条件。做学问需要经济打前站,即便“饭疏食饮水”,也要有最低保障。

浙江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比较快,可说是南孔与当地文化结合,发展了孔子“富而可求”的思想。永嘉学派的叶适反对朱子的性命说,高扬事功价值,超越了原始儒学。浙东学派的陈亮也属于功利主义儒家,他借用《周易》的说法——“义者利之和”,对和谐的内涵有特别的解释:在利益冲突中达成利益均衡,这是很了不起的儒商观。在他看来,如果事情做对了,就一定有利。反命题也正确,只要有利可图,事情就做对了。正所谓“功到成处,便是有德”(陈亮),功利+德性便是“功德”,事功与道义相融,接近墨子的观点——“义者,利也”。企业把钱挣到手,解决了就业问题,就有道义;同时,企业提供的商品与服务是消费者所需要的,也符合道义,当然也有利可图。

明清实学与佛道虚学相反,

对理学与心学不以为然。代表人物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认为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要重视西方的科学,主张经世致用、济世救民,从重本抑末走向了工商皆本,由四民相分到四民相通,由重义轻利到以义为利。实学后来流传到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成为有影响的国际学问。

涩泽荣一一是日本明治和大正时期的著名实业家,涉足金融、保险、矿山、铁路、机械、印刷、纺织、酿酒、化工等当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被称为“日本实业之父”“近代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日本产业经济的最高指导者”。到了晚年,涩泽荣一积毕生经验,写下了《论语与算盘》一书。他认为儒学是实学,孔子并不贱商,《论语》甚至堪称“商业圣经”,儒家的真精神与工业文明有一致性。追求利益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缩小仁义与算盘的距离是最重要的事情。义与利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者都好,才有幸福可言。人们尽可以放手追逐阳光下的利润,而不必以为这样于道德有亏。他倡导“行动《论语》”,提出“士魂商才”说,既要有士(文化)的操守,也要有商(实业)的才华。涩泽荣一把孔子精神与欧美经济伦理结合起来,奠定了日本企业思想的基础。现代儒商思想发端于日本带有必然性,他们进入工业文明更早些。但是我们后有发优势,因为儒学起源于中国,如今中国的经济奇迹世界瞩目,在文化重建中,儒商发展自然会有土壤。

(本文作者为青岛大学教授)

